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张荣华
编

康有为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张荣华
编

康有为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康有为卷/张荣华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300-20642-4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②康有为 (1858~1927) - 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15923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康有为卷

张荣华 编

Kang Youwei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36.5 插页 2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585 000	定 价	87.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 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17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19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1840年到1949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 1840 年至 1949 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疵，敬请方家指正。

维新事业在美洲的拓展与挫折（代引言） ——梁氏档案藏康有为书札考释

《南长街 54 号梁氏档案》（两册，中华书局编辑部、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编，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 10 月）下册收录康有为致梁启勋书札二十通。这是目前仅见的两人之间的通信，其内容在揭示保皇会海外活动真相、充实历史细节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康氏手迹是出名的潦草难辨，原编者的辨识工作值得充分尊重，但提供的释文存在一系列错失，各函系年亦皆误，致使信函内容不能显明。兹据原稿影件重作辨识，按重订年月先后移录于下，并就信件具体内容略作引论疏解。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是正。

（一）1904 年 12 月 17 日

仲策仁弟：

来书悉。久不见，想勉学所进如何。近人媚外太甚，乃尽全中国之所有而失自立之性。吾遍游欧十一国，深得其故，所过我者但物质耳。故今但师西之工艺物质足矣，如道德之本，中国自足。弟其思之，陶性情而勉道德为贵。杜威吾已知之，快入美相见。此问
动定

十一月十一日

此书用加拿大“北温哥华旅馆”信笺，系康氏 1905 年 2 月 12 日入美前写于温哥华。其时刚完成《物质救国论》一书的写作，书中总结 1904 年 6 月至 11 月间游历意大利、瑞士、奥地利、匈牙利、法兰西、

丹麦、瑞典、比利时、荷兰、德意志、英吉利十一国的观感所得，强调“一国之强弱在国民学、物质学二者”的思想宗旨，在此信中也有明白表露，康氏入美后的言行作为，也可以由此函所述得以理解。信中提及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但在美期间并未有会见的记载，所谓“快入美相见”，应是指与梁启勋会面。

(二) 1905 年 3 月 22 日

得书悉。我久病数月，人事多，愈之甚难，故各处来书如山积，多不暇复。汝所言本甚是，何有所嫌耶？今在罗生租屋养病，俟愈后乃能游它埠。草此数字答汝。此问

仲策弟动定

二月十七日

此书用“保皇会会长用 (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 Headquarter For Use of the President Only)”专笺，写于抵达美国洛杉矶一周后。康氏在 1904 年 11 月已患病，来美后由当地保皇会负责人谭良（字张孝）、莫云屏照料生活起居。谭良外甥女谭精意曾回忆“康在洛杉矶度过了两个月时间，主要由谭做东，在西湖公园边给康安排了住房。康不喜欢吃美国菜，他又安排康最喜欢吃的蒸鸡和蒸鸭。康称赞谭夫妇俩是真诚的爱国者和智者”。康氏在一年后仍对这段经历念念不忘，先后三次赋诗赠谭，感怀“门人谭良及莫云屏诸同志为予赁宅罗生之西湖养病，每日夕绕湖一周，至乐”。后来两人因财务问题关系破裂，康诗收入《万木草堂诗集》时，题注中谭良之名均被涂去。

(三) 1905 年 6 月 16 日

累书悉。此人本知其多术，不料其若是也，但不知有言我等避其教不耳。若然，则须驳之。今午已见总统（梁诚力阻三日）。总统言，禁约事不忍刻酷，必竭力挽回，上等人、游客、学生、商人必宽待云云。今再拟再见，与谈镑价事，欲我党领之。未知得否耳。

芝埠情已悉，国贤谓以支马车费耳。我到会所数次闻彼等何言，皆无言语。我问伟南，伟谓不须。后有数信请见，不过攻伟南、岐山、余支南等。各埠多有此，然吾实无术遍接大众也，今已

函问之。纽埠尤散尤难。然吾实无权，奈何奈何！

章程仍望汝撰，因张孝等不如汝之深也，功课毕后为之亦可。须数日后乃能往纽约也。横滨两电皆问款，已寄千元矣。一公电称津、汉、沪、港皆开拒约会，请汇款济云云。此复问。

康氏于1905年6月10日离开洛杉矶抵达华盛顿，此书作于6月16日拜会罗斯福总统当日。（参见谭精意：《〈康梁与保皇会〉序》，见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谭良在美国所藏资料汇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阻挠他见美总统的梁诚时任清朝驻美公使，康不久后作《再论梁诚赈事》予以攻击。“禁约事”，指1904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条约永远有效的法令，禁止华工入境。1905年5月4日康在洛杉矶已向各地保皇会发出公电，强调：“此事关我华人生命，于粤人尤甚，计粤人在此岁入数千万，若能破约，岁增无量数。吾国生计已穷，若美工尽绝，势必大乱。望大集志士，开会鼓动，电政府及各督抚力争，并以报纸激发人心，或可挽回。”（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113页）待面见罗斯福时，康又重申废止排华条约之事，并得到后者善意的答复。“镑价事”，指《辛丑条约》所定巨额赔款原以银两结算，1904年列强改定以金镑结算赔偿。康氏在加拿大时已闻此事，故打算再约见总统，争取以在野党首领身份谈判中止此变相勒索之举。但他是否如愿再见罗斯福，并无文献记载证实，须等到以后康氏《美国游记》刊布后印证。此函的突出价值即在首次证实康氏确曾拜会美总统之事。康同璧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乃父续年谱时，对此事讳莫如深，绝口不提。鉴于当时国内反美情绪高涨的背景，此举似乎情有可原，但波及康氏遗作遭湮没则难辞其咎。康氏拜会墨西哥总统后，接连赋诗撰文以志其盛，在欧洲会见大小政要后亦莫不如此，准此而言，也必有诗文记拜会罗斯福事，而关文字未见存世，也归咎于其女。康同璧是系统整理康氏著述的第一人，《万木草堂遗稿》的编辑过程，也是遗稿受到删改的过程，例如将《印度游记》手稿与《万木草堂遗稿》整理本对勘，不难发现手稿已被改得面目全非。

信中提及起草“章程”之事，并称将前往纽约，其中透露的信息颇具价值。7月康在纽约主持召开保皇会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颁行《保皇会会议改定章程》，它对指导保皇会未来发展方向至关重要。《二十世纪初康有为保皇会在美国华侨社会中的活动》（周伟浓著，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一书考定该章程由康本人起草并

改定（参见上书第二章第一节），比照康信，此论应予纠正，这份章程必由梁启勋草拟。章程中不少条款与梁启超 1903 年游美时拟定的《罗生枝利保皇会章程》有雷同之处，可知梁启勋起草时是以乃兄之作为参考范本。

“此人”指孙中山，起首几句话反映革命党与保皇党各自为争取华侨的认同和资助，将相互攻击的战场延伸到了美国。“芝埠”、“纽埠”，指芝加哥、纽约。周国贤是康氏游欧时的亲信随从兼英文秘书，他在芝埠保皇会支取车马费，引起当地会员的不满，使得康氏要亲自出马平息。其时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叹苦经，表达难以掌控大局的失落感，间接反映出他与北美各保皇会的关系并不融洽，缺乏实际掌控权，这也是康氏要在 7 月召集代表开会以整顿会务的原因之一。

（四）1905 年 6 月

离索久矣，不知弟意识德性若何。（汝兄近困甚。未知汝学费接续否，吾筹得当以济汝。）得与张孝书，乃见弟之至性及才识，为之大喜。其“厚者薄而薄者厚”一语，可为论人之圭臬，亦为人之根柢。汝兄之好处，全在德性厚，不然今之聪明者多矣，何所用耶？吾一生作事任国，皆从不忍人之心出，非有所徇于外也。汝能若此，它日可成大才。吾喜极无似，不意能进德若是也。望终一身以汝之言为依归焉。所论某人精当万分，勉学自惭。下月当来。病无术可愈，非离美绝应酬不能望也。筹款无术，四面交迫，与汝兄皆苦甚，安得如汝之从容为学乎。此问

动定

两浑

此书未署年月日，当作于初离洛杉矶赴华盛顿等地参观之际。“下月当来”，指 7 月在纽约开保皇会大会时与梁见面。所谓“筹款无术，四面交迫”，也是康氏要在大会上推出筹款新举措的直接动因。

（五）1905 年 7 月 22 日

得书甚喜。汝言是也。（我事多，一时误徇仪侃书而立发，未详思也。）我此次见汝，非常之喜，不独学问，乃办事、见识、耐

苦无一不大进，再勉之。汝欲往何学，我必筹与汝。（闻有速成学，三年可入大学。）顷议院毕，所筹颇有得，各处银行股甚踊跃。（不知将来能实行否。）拒约事尤得手，《时报》已公议拨美金万扶之。顺此告。罗昌忽来见，甚可喜。此问

仲策弟动定

六月廿日

信尾提到来见的罗昌，是美国檀香山华侨后裔，后娶康次女康同璧为妻，他于1906年春留学英国牛津大学，故此信应写于1905年。康先前在纽约已与梁启勋见面，信中对其多有奖饰之词，其中应有赞赏其起草大会章程之意。《保皇会会议改定章程》明示“顷商务惟以专办银行最为大利”，计划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初期招股事项似乎进展顺利，康在信中流露出比较乐观的心情，期待能实现“集美金四五十万，便可得中国银一百万，即可开办一大银行”的预期目的。“仪侃”是陈继俨的字，他是万木草堂弟子，康氏倚重的保皇会骨干。“拒约事”，即本文1905年6月16日函提到的抵制美国排华条约之事。狄葆贤创刊于上海的《时报》，是保皇会在国内的喉舌，在这次拒约运动中起了关键作用。

（六）1905年9月25日

一、我遗下象牙嘴鞭竿一枝，未知遗下会所抑客栈，望即查获，代我存好。

一、我是又责芝埠十人甚重，彼等怒如何，可查告。各埠皆我演说后立题名，至少亦得百余，惟芝埠却我，乃竟三个月无人入联卫。

一、芝埠不独令牌不发，联卫不一做，乃至拒约款亦不一交。遍各埠无如芝之奇者，因何故？我欲再三函责之，可不可，复。仲策弟

八月二十七日

再者，我今欲令梅圣杰为演说专员，兼收款，如梁文畅一样，汝谓如何，可商定。其人热心矣，操守如何？今发来文凭，若以为可，可给与之，若操守不足则收回，派镜泉。如何，可复。

（另纸附）梅胜杰爱国热诚，辨才动众，派充办理联卫部专员，并保皇会演说员，所至催收公款，会同该埠董事签名办理。光绪卅

一年八月。更生。南海康有为印。

保皇会大会结束后，康氏即在美境内漫游，此信用蒙大拿州比令市“北方旅馆”笺，主要谈及大会新订制度的施行情况。“联卫”是“联合卫身”的简称，联卫制是1905年保皇会大会新推出的会员福利保险制度，康氏将联卫部这一新设机构置于核心位置，会员“其不入联卫部者，几与不入会同”。加入联卫部并享受生老病死福利待遇的前提是交纳“月供费”，“凡交联卫月供者，收足十二个月后方能照例保护”。除了一年的月供费（最低六元），尚有义务性质的联卫“月捐费”，两费相加后的数额非常可观。康氏规定收缴所得与入会费一样，三成留本会，七成汇交总会，这意味着他可以总会长名义支配大部分费用。《保皇会会议改定章程》中特地举出芝加哥等五地保皇会为样板，称许那里多人踊跃加入，已具体实施联卫制度。但康氏写信之际已悉实情，梁启勋拟《保皇会会议改定章程》所述只是一厢情愿之词，数月内芝加哥无一人加入联卫部。这无疑是在断其财路，故而康“再三函责”之余，另出招数，打算委派专员督办此事。事实上这也是无奈之举，当时芝埠保皇会会长是梅宗周，梅氏家族在当地华侨中极具影响力，康氏既不便得罪梅姓势力，又想要财源通畅，遂有派梅氏宗亲成员督办的举措。信中提及的“梁文畅”，是美国保皇会负责人之一，代康有为向各埠保皇会收缴会费；冯镜泉原为日本华侨商人，曾任日本横滨保皇会负责人，时任蒙大拿州保皇会负责人。

（七）1905年11月25日

明日入墨矣。美约一事，美人似颇知我所为，若知可查报我。芝埠各事皆未举行，其它尚可。若联卫乃筹款之要。今派卅人日本游学，派十人欧美游学，若联卫不大成，则我担此款甚难矣。望弟留意。广智本太重实难，有累我大局，吾决归还新招之股（但不知连旧股清交好，抑听之人，汝思之），以松汝兄之担，俾汝兄得游学也。今往汝卅金可收，学费足否？可随时告我。（有书寄黄宽焯转交可也。）墨总统有书来接，此行于辟地或少有得。南洋购得一地廿余哩，稍放心也。此问

仲策弟学益

明夷 十月廿九日

康氏写此信时身处美国西南毗邻墨西哥的得克萨斯州，用圣安东尼市“阿拉莫广场”笺。有关康第一次入墨的确切时间，《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及研究者的说法不一，据此函可确定为1905年11月26日。“美约一事”可参见本文1905年6月16日函释文。此信对实施联卫制遇阻事仍难以释怀，直言其不利于人才培养大计。康有为虽然流亡海外多年，但一直坚信有回国执政之日的到来，因而培养专门人才以备日后执政之需，成了康氏欧游以来一直萦绕心头的大事。信中透露已派定四十人分赴欧美、日本留学，其中包括梁启勋、麦鼎华、徐良、罗昌等，几乎清一色的亲信子弟及其后代，反映出康氏“用人唯亲唯旧”的理念。有关近代中国留学史的研究，实应补上万木草堂留学运动这一章。由于财务运转不畅，资金短缺，不久后资助留学规模便锐减至七人（参见本文1909年4月13日函）。

康在信中抱怨广智书局（保皇会投资创办于上海，由梁启超分工负责）股息负担重，无力承受向日本华侨股东派息之任，打算清退新招之股，目的也是想保证留学计划不受牵累。后来康并未行退股之策，改令香港总局输款顶股，但此举也未奏效，致使1907年出现因广智书局停息而股东哗闹之事。这件事也是导致康、梁不和的重要原因。

黄宽焯是墨西哥华侨巨富，也是墨西哥保皇会会长。康在墨半载，即由黄一手款待并提供自己在莱苑（Leon，今译莱昂）的住宅，他也直接参与了康在墨的各项商务活动。1908年时两人因财务问题闹翻。此信表明初次入墨的目的在买卖地皮以牟利，及至入境实地考察后，才逐渐酝酿形成开大银行、办大公司的计划。首次入境，他也并未见墨西哥总统，研究者皆误信《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之说，实际是在第二次去墨西哥才拜会迪亚斯总统（参见本文1907年6月18日函）。

（八）1905年12月13日

书悉。经年游美，所筹得联卫内外部计岁必得二三万圆，此外尚有公款清旧款、缴票款，一切累积之，以为杂费。今定以美金一万养欧美学者，华金一万养日本学者（恐不支，拟作商业支持之）。以此三万为度，真既竭吾力矣。派人除今林铎、国贤数人外，已令滨、沪、港公举同学有志者。岳崧之事我知之，其伙已有数书来，攻之甚至。（汤甚横悍，甚至谓我召之，而欲登报攻我。可告人勿

信之。)然此事我知根由,其汤某言不足信也。其人实无他,惟少不可则掉头而去,及不识人情耳。(今其未接我书而去,想又有他支离。)汝有何他闻,可告我。今者汤言概不足信。此问

仲策弟学益

十一月十七日

此信作于抵达墨西哥半月后,康氏仍惦念着为实施留学规划筹措专款之事。他估算游美一年保皇会的各项岁入,对联卫一部所得寄予厚望,并据此定下每年拨付三万元作资助留学专款。信中指定其游欧亲信随从林铎、周国贤等为留学资助对象,并要横滨、上海、香港等地保皇会推举候选人。“联卫内外部”,指当年保皇会代表大会通过实行联卫制度后,新设立的联卫内部、联卫外部,前者从事“救国”大事公事,后者经营“恤身”家事私事。“公款清旧款”,指各地保皇会截留未汇交总会的会费。“缴票款”,指大会新定以会票作为会员身份凭证,会员领取会票时须交纳一美元。“岳崧”指陈岳崧,在美留学,与康氏女儿康同璧关系密切。“汤”均指汤昭,美东保皇会负责人之一,不知因何事惹怒了康有为。但康在同时复谭良函中也表达了对陈岳崧的不满,“极喜人人攻岳崧。我敢思之,行遍全美,不得一人兼中西文而办事妥当者也,独忽然引去一事为太奇特耳”(1905年12月26日与谭张孝书)。

(九) 1906年1月16日

陈煦者,昔波士顿创会者,今欲返国创电事,请我借二百美银。此人若何,应如何覆之?若能婉却,弟就近代复。倘其人确有旧,宜照料。弟查明复我。陈文惠在芝埠与人若何,彼言余变局相攻,是否可查复。此问

仲策弟动定

十二月廿二日

“陈煦”,即陈熙,字永海,广东新宁人,曾在纽约电机公司学习数年,后任职于宾州电机制造公司。他于1903年初发起成立波士顿保皇会并自任会长,但次年即辞去会长职,谋求回国发展电机制造业。纽约的《中国维新报》曾刊出驻美公使梁诚为他开具的回国执业凭照。有研究者认为此事既表明清政府驻美机构对保皇会的“暗中帮助”,又属于保皇会为会员办好事的典型案列,“是保皇会为其骨干人员寻找的一条